

五四新文學場域與 劉半農的思想轉向

• 邵 棟

摘要：劉半農作為五四新文學的代表人物，其文學觀念與創作一直受到新文學研究的重視。然而其初入《新青年》文人圈時與同仁的思想分歧，以及離開之後所流露的保守思想傾向，都未能得到清楚的闡釋與解讀。本文聚焦劉半農加入《新青年》文人圈（1917年）到徹底退出《語絲》、與「文學革命」同仁割席（1928年）這段時間的創作與思想變化，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Field Theory）和羅志田有關邊緣知識份子的論說，對這個問題進行新維度的詮釋，以期對劉半農個人思想的複雜性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知識份子之間的張力作更深入的詮釋，企望挖掘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他作為特殊個體的思想史歷程。

關鍵詞：啟蒙 五四新文學 場域理論 邊緣知識份子 劉半農（儂）

劉半農（劉復，初字半儂）是以五四新文化運動重要成員的身份為人所熟知的。這位《新青年》的主要編輯，曾發表〈我之文學改良觀〉等重要論文，為新文化運動搖旗吶喊，也是白話詩運動的發起人與實踐者之一。在一般文學史家的敘述下，他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就是1918年與錢玄同在《新青年》炮製的「雙簧信」事件，使原本只在一小部分知識份子與學生中產生影響的《新青年》，成為知識界爭議與討論的焦點。而之後劉半農對於「她」與「它」字的發明，亦影響了後來的白話文發展^①。

仔細研讀劉半農新文學時期的創作及文學理論，當會發現他與《新青年》大部分同仁有着明顯的不同：他在《新青年》時期主要鼓吹的是文學語言「白話化」與內容的通俗化，偏向技術層面的「改良」，與胡適的主張相對接近，但他的作品缺乏胡適、魯迅等人強烈的思想啟蒙色彩。劉半農加入《新青年》文人圈初期與早前在上海為通俗雜誌撰稿時的改良主義傾向基本同調，而在參與《新青年》編撰的一年多中，劉半農自己也被啟蒙，在新文學同仁圈子的壓力

之下，逐漸被「罵掉了豔福的思想」^②，放棄了「舊感情」^③，洗刷了自己的「少年滑頭氣」^④。他依照着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意識，較為被動地適應並改變自己的文學範式與思維方式，乃至生活態度。如果因為劉半農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一員，就將「新文化」的意涵套在他的思想主張上，顯然是有欠周全的。實際上，五四式的激進並非劉半農的人生常態；但在《新青年》十六個月（1917年8月至1919年1月）的「例外」的激進狀態，卻在普遍認知層面上遮蔽了他一輩子的行止。

劉半農在新文化運動中曾以一個被啟蒙者的身份，與《新青年》同仁一起參與到這場中國近代最重要的思想革命之中，他的思想變化與知識份子身份認同的變遷，深度體現了這場運動的革命性與豐富性。過去對於劉半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徐瑞岳《劉半農研究》、《劉半農年譜》與《劉半農評傳》三本著作最為典型，是研究劉半農的學術性與資料性著作。但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作者一力拔高劉在五四時期的功績，將「新文化」的意涵套在他身上，而忽略了他更為複雜的實際思想狀況^⑤。海外研究者如賀麥曉（Michel Hockx）、洪長泰等人的著作雖有專門章節論述劉半農，但主要聚焦在其文學作品的內容與風格，比較欠缺對劉在五四時期思想轉變的考量^⑥。本文從劉半農五四時期思想變化的角度入手，辨明劉與其他五四同仁的區別，並以劉半農這一個案管窺新文化運動背後豐富與複雜的思想與背景。本文將聚焦劉半農加入《新青年》文人圈（1917年）到徹底退出《語絲》、與「文學革命」同仁割席（1928年）這段時間的創作與思想變化，運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Field Theory）和中國歷史學家羅志田有關邊緣知識份子的論述，來分析劉半農的思想轉向以及其本身的知識份子認同問題。

一 加入《新青年》前後：新文學場域對劉半農的啟蒙

辛亥革命後，為了維生，中學肄業的劉半農從江蘇江陰到上海尋找工作機會。他先後輾轉於《演說報》、「開明劇社」、《中華民國報》、《時事新報》等處謀事，做過編輯、編劇、職業撰稿人等。後來在徐卓呆的介紹下，劉半農於1914年加入中華書局，成為一名正式編輯。接下來兩年多是劉半農生活較為穩定的時期，也是他創作通俗文學的高峰期，即學界常說的「鴛鴦蝴蝶派」時期。劉半農雖然在這一時期進行通俗小說等類型的文學創作，但作品很少涉及豔情風化的內容，多為偵探和社會批判類型的小說。然而，由於中華書局的股權改制引起大裁員，劉半農在1916年失業。他生活無着，一度舉家回江陰生活（期間曾赴北京謀生）。在給《中華新報》投稿的過程中，他認識了陳獨秀，此時《新青年》成立已經接近一年，陳獨秀便邀請他為該刊撰稿。劉半農之所以成為《新青年》撰稿人，起初經濟上的原因很主要。如果說1913到1916年劉半農主要為「中華系」的雜誌（《中華新報》、《中華小說界》、《中華教育界》、《中華婦女界》等）撰稿，那麼自1916年下半年開始，變成「個體戶」的劉半農，藉着他積累的一定文名，幾乎尋找一切機會在各種雜誌上投稿，產量很大。

劉半農此時給《新青年》的稿件與他在上海時期的通俗作品並沒有太大差別，以翻譯為主，也沒有思想革命的內容。而受到胡適與陳獨秀啟發而作的〈我之文學改良觀〉和〈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都是在1917年確認赴京加入《新青年》文人圈之後的事情^⑦。陳思和曾指出新文學有兩大啟蒙傳統，一是「啟蒙的文學」，重點在啟蒙，文學是作為啟蒙的手段存在的；二是「文學的啟蒙」，重點在文學，它指的是文學本體意義上的啟蒙（白話代文言等）^⑧。劉半農兩篇文章談的都是「文學的啟蒙」，而非「啟蒙的文學」，主要關注文學的形式層面而非思想層面。可以說，他並不是因為思想進步而接近《新青年》，而是因為接近《新青年》才顯露出思想進步的傾向，倒是處於被啟蒙的角色。

在確認赴京後，劉半農與陳獨秀就「文學革命」問題曾經有書信往還，但劉半農立意主要還是在「文學改良」^⑨：

改良文學，是永久的學問；破壞孔教，是一時的事業。因文學隨時世以進步，不能說今日已經改良，明日即不必改良。孔教之能破壞與否，卻以憲法制定之日為終點。其成也固幸，其不成亦屬無可奈何。故青年雜誌對於文學改良問題，較破壞孔教更當認真一層。尤貴以毅力堅持之，不可今朝說了一番，明朝即視同隔年曆本，置之不問。

劉半農以為文學改良最要緊，而破壞孔教不過是一時之策，是「其成也固幸，其不成亦屬無可奈何」，並沒有極其決絕的立場。他將破壞孔教視為文學革命的鬥爭策略，並非指向思想革命，對儒家思想也沒有明確的不滿態度。在新文化運動十多年後，劉半農曾談起自己的這種鬥爭策略^⑩：

十年前，我是個在《新青年》上做文章反對舊劇的人。那時之所以反對，正因為舊劇在中國舞台上所佔的地位太優越了，太獨攬了，不給它一些打擊，新派的白話劇，斷沒有機會可以鑽出頭來。到現在，新派的白話劇已漸漸的成為一種氣候……所以我們對於舊劇，已不必再取攻擊的態度；非但不攻擊，而且很希望它發達，很希望它能於把已往的優點保存着，把已往的缺陷彌補起來，漸漸的造成一種完全的戲劇。正如十年前，我們對於文言文也曾用全力攻擊過，現在白話文已經成功了氣候，我們非但不攻擊文言文，而且有時候自己也要做一兩篇玩玩。

劉半農對文學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內在態度，其實與《新青年》同仁是有着較大區別的，乃至多年後重述，才公開坦承自己當時的決斷也有違心的一面。

劉半農在《新青年》前後工作大約十六個月。他在1917年8月底抵達北京後就開始參與《新青年》文人圈有關雜誌的編撰，1918年1月正式擔任《新青年》編輯，直到1919年1月退出。這一年多是他人生中最為人留意的階段，而他也在這過程中，被裹挾着、半被動地完成了思想轉型，並為新文化運動及其一整套新的思想話語搖旗吶喊，衝鋒叫陣，對民眾做文學啟蒙的工作。

劉半農進入《新青年》，其實還得罪了不少上海通俗文學圈的人，包括對他有知遇之恩的包天笑。自1916年失業後，劉半農以撰稿維生，而「鴛鴦派」作家包天笑主持的《小說畫報》與《小說大觀》成為他投稿的主要園地。1916年10月《小說大觀》第七集發表了他的翻譯小說《看護婦》，該小說的原作者是法國作家歐勒魯(Max O'Rell)。劉半農開篇即云：「是篇與天笑先生所撰《一縷麻》情節、結構頗相類似。可見中西文豪會心不無符合處也。」^⑪該小說被安排在刊物第一篇發表，亦可見包天笑對他的重視；隨後劉半農許多作品都登在刊物的重要位置上。1917年3月《小說畫報》第三期發表的《可憐之少年》署名是「半儂起稿，天笑修辭」^⑫，包對劉的提攜之情溢於言表。

1917年3、4月間，劉半農的《歇浦陸沉記》還在《小說畫報》連載，那時他大概是收到了陳獨秀的消息，準備去北京發展，於是四處預支稿費以做盤纏。包天笑多年後回憶道^⑬：

還有一位新作家是劉半儂，(後改名劉半農)我也忘記是誰介紹來，他寫了一個長篇，開頭還好，後來不知寫到那裏去。向來雜誌上的稿費，都是分期付款的，而且要出版以後付的。有一天，他跑到我家裏來，他說：「這長篇完全寫成了，你付給我稿費吧。」我問何以如此急急？他說有一機會，要到北京去，以此稿費作旅費，請幫幫忙。但是我向沈子方說，他不肯付，他說：「不能破例。」而劉半儂又迫得我甚急，大概為數有六七十元，不得已我只得挖腰包墊付了。以後劉半儂從未見過面，亦未通過信，而他的到法國、考博士，榮任北大教授，也可算得一帆風順了。

明明兩人有來往，包天笑卻表示對他很陌生，甚至語帶諷刺，有論者便認為包天笑是對劉半農在新文學運動中「倒戈」感到不滿^⑭。此外，曾經與劉半農同為中華書局編輯的朱鴛雛也在宴會中譏諷過他：「他們如今『的、了、嗎、呢』，改行了，與我們道不同不相為謀了。我們還是鴛鴦蝴蝶下去吧。」^⑮自然，曾經在上海通俗文學圈創作頗豐的劉半農，自從加入《新青年》後，開始攻擊舊文學，也就不得不遠離過去的寫作圈子了。

劉半農在通俗文學這一邊已經走到了盡頭，然而他初到《新青年》的時候日子同樣也「不好過」。他那格格不入的「風格」(style)受到《新青年》同仁的不少批評與糾正：

當初劉半農從上海來北京，雖然有志革新，但有些古代傳來的「才子佳人」的思想還是存在，時常在談話中間要透露出來，彷彿有羨慕「紅袖添香」的口氣，我便同了〔錢〕玄同加以諷刺，將他的號改為龔孝拱的「半倫」，……半農禁不起朋友們的攻擊，逐漸放棄了這種舊感情和思想，後來出洋留學，受了西歐尊重女性的教訓，更是顯著的有了轉變了……^⑯

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豔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給我們罵掉了。但他好像到處都這麼的亂說，使有些「學者」皺眉。^⑰

〔劉半農〕本來是在上海做無聊小說的，後來陳獨秀請他到〔北大〕預科教國文。當時大家很看他不上，不過慢慢的他也走上了正路了……當時劉半農就做了一篇甚麼連刁劉氏鮮靈芝都包括進去的一封覆信，狗血噴頭地把這位錢玄同的化身王敬軒罵一頓。這封信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後來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喪。劉半農還有篇〈作揖主義〉也是同樣輕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他不起……^⑩

他的風格 (taste) 不高，有時不免有低級風趣，而不自覺。他努力做雅事，而人但覺其更俗氣。^⑪

從上述言論可見，《新青年》同仁對劉半農身上傳統封建元素的批評非常尖銳。他也承認自己「時餘穿魚皮鞋，尤存上海少年滑頭氣」^⑫。穿着、言語、思想所構成的一整套價值觀，成為《新青年》同仁所關注的「風格」問題。劉半農對於這些批評是接受的，也願意融入到這個新的圈子中，按照他們的規矩來做。他坦承自己的文學傾向發生了重大的轉折，並且將要自我洗刷，完成轉型：「即如我，國學雖少研究，在1917年以前，心中何嘗不想做古文家，遇到幾位前輩先生，何嘗不以古文家相助；先生試取《新青年》前後所登各稿比較參觀之，即可得其改變之軌轍。——故現在自己洗刷自己之外，還要替一般同受此毒者洗刷，更要大大的用些加波力克酸，把未受毒的清白腦筋好好預防，不使毒菌侵害進去。」^⑬

劉半農從通俗文人圈跨界到《新青年》文人圈，本來只是為了餬口，卻由此走入中國近代最重大的思想革命中間。而他作為參與者同時也是被規訓者，經歷了極其劇烈的思想轉型。兩個文人圈所標榜的知識、價值觀、倫理、行動準則都有着天壤之別。這也是兩者之間刻意營造的藩籬，以突顯其意識形態的獨立性。

筆者認為，劉半農在不同文人圈的輾轉所引來的批評，符合布迪厄所謂不同知識場域之間的爭鬥。布迪厄在其〈文化生產的場域〉（“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中所指出的「場域」概念，描繪的是一個以權力為經、關係為緯的文化空間網絡；一個「文化生產場域」，即是由文化生產者，包含生產者本身（如《新青年》同仁；通俗文學作家）、生產機構（如《新青年》雜誌；上海的通俗雜誌），以及其他社會力量如政治權力的支配與其餘特殊資本（新文學作家以及舊派文學作者所要爭奪的知識界的思想話語權，即象徵資本）所形成的網絡空間^⑭。知識（份子）場域就是象徵物品生產者（如藝術家、作家、學者）爭奪象徵資本的地方，知識場域的各種體制、組織和市場都以象徵資本的生產、流通和獲取為其主要特徵。

而在不同場域之間，也有着對外的象徵資本爭奪，就是各自標榜的「慣習」（habitus）之間的競爭。在新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競爭中，各自的生活方式、價值觀、文體、組織形式、經濟情況都構成自我認定的「標準」，標準之爭就是話語權（象徵資本）之爭。布迪厄用「慣習」來解釋存在於不同場域之間的同型關係，「慣習」指的是「不同領域間活動的統一原則」，這就指涉了一種習慣狀態（尤指身體），特別是指一種趨向、素質、偏好，形成種種不同的行

為傾向(自我期待、應對方略、行事標準等等)。這樣一整套的「慣習」,一方面在制約行為,另一方面又在產生行為。慣習是行為的結構性限制,但又是行為(包括觀察、自我期許)的生成模式²³。簡言之,在哪個圈子裏,就要有圈內人的樣子。

劉半農受到上海通俗文學圈影響而產生的文言文寫作、着裝風格、對女性的態度、格調和倫理,都要在轉換到新的文學圈後進行洗刷,在祛除過去的那一套「慣習」之後,同時需要習得新文化場域中的一整套價值體系與行為準則,才能被圈內人接納。劉半農在正式成為《新青年》編輯的第一天就把名字「半儂」改成了「半農」²⁴,拋棄上海的香豔,採取樸實的民間路線。這顯然是一種身份轉換的象徵:代表舊派的「劉半儂」留在了過去,而作為新派知識份子的「劉半農」誕生了。他就是在這個由舊入新的過程中,半被動地向現代知識份子轉型:「採納這種風格並不完全是自由選擇的事,而是他根除『上海風格』——生活風格(方式)或寫作文體——全部努力的一部分。」²⁵

魯迅回憶中劉半農作為「一個戰士」的形象²⁶,就是在這裏開始產生的。也許劉半農未必同意新文化運動的所有主張(如用白話取代文言,反對儒家等),但他感到這是一項重要的事業,於是決定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將矛頭對準了反對新文學的人:

前三四年,上海的各種小說雜誌極盛的時候,內容大都是做的一半,譯的一半。那譯的一半,雖然大都是「哈葛德」、「柯南達里」諸公的名作,卻還究竟可以算得一種東西;那做的一半,起初是風花雪月,才子佳人,後來竟一變而為《黑幕》一流的文字了。²⁷

這等人,恆以「融會中西,斟酌新舊」八字為其營業之商標!然其舊學問,固未嘗能做得一篇通順之文字;其新學問,亦什九未能讀畢日本速成師範之講義。以此之故,彼輩雖日日昌言保存國粹,灌輸新知,而其結果,則凡受彼輩薰陶者,文字必日趨於不通,知識必日趨於浮淺。²⁸

天天報紙上所登的新書廣告,無非是甚麼《黑幕大觀》、《小姊妹罪惡史》或者紅男綠女的肉麻小說,「某生」、「某翁」的腐敗小說;連提倡「丹田」的謬書,扶乩的鬼話,也竟公然出版;最高等的,也不過影印幾部宋版、元版的無用古書,便算空前絕後的大事業了!唉!²⁹

從上述的批評可見,經過《新青年》同仁的一番勸導,劉半農原本模稜兩可的改良主張,逐漸變得尖銳起來,對於「鴛鴦派」、「國粹派」,以及種種迷信腐化的風俗觀念展開了空前的批評,與他最初在《新青年》上撰稿時的態度大異其趣,而這也可見其「洗刷自己」的決心。

在布迪厄的場域視野中,文化場域之間的競爭是在大眾文化市場的大範圍中進行的。對於文人來說,在有限範圍內進行文化生產和競爭是生死攸關的事,其關鍵是專業合法性(文學的正統性)。文學是非常專門的文化市場,這些文化市場參與者所爭奪的不僅是同僚的認可,而且還包括設置標準和合

法性的權威。而建立具有高度區分度的「區隔」(distinction)，則是場域間競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³⁰。

劉半農在調整了自己的價值取向與慣習之後，所要做的自然是向當時所身處的知識場域的競爭者，也就是舊派文學陣地發動猛烈的進攻，區分敵我，建立「區隔」。以新的「慣習」來否定舊的「慣習」，也就是否定過去的自己。劉半農加入《新青年》之前寫作的〈我之文學改良觀〉與〈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態度比較溫和理性，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筆調接近，偏向說理且沒有那麼強的攻擊性。在兩篇文章中，劉半農強調需要寫作「真文學」，求真求善，言之有物³¹；同時建議文學改良（而非「文學革命」）需要多樣化：「文言」與「白話」可以獲得同等地位；「破壞舊韻，重造新韻」；「增多詩體」；提高戲曲的地位等等³²。劉半農抨擊了舊文學形式上的一些局限，並且提出他重視民間文學與拓展文學形式的一些意見。此時，他對舊文學並沒有攻擊性的言論，更不用說有批評傳統儒家思想的意圖了。而他為人所熟知的文章與戰鬥姿態，自1918年1月正式加入《新青年》編輯部並更名為劉半農後，才真正開始。

二 劉半農的戰鬥策略與離開《新青年》的關係

確定了戰鬥性的綱領，明確了鬥爭對象，「洗刷」了自己的劉半農才能寫出富戰鬥色彩的文章。他寫文章與批評時事本來就很在行，諷刺手法也非常犀利潑辣，於是在這些文章中發揮了他的文字優勢，非常善於「罵人」³³。然而，從上海時期到此時，劉半農始終不是一個以思想性見長的人。

在劉半農的論戰事迹中，「雙簧信」事件是最為人所熟知的，一方面是由於此事在新文化運動中造成的效應和意義；另一方面也在於整件事情的戲劇性。《新青年》改制之後，開始對舊思想、舊文學、舊制度展開毫無留情的猛烈批評，通過編輯的專文討論以及與讀者的書信往還，發揮宣傳新知、啟蒙民眾的作用。然而，《新青年》作為北京大學新派教員的同仁刊物，主要以高校學生與年輕人為受眾對象，影響範圍與勢力畢竟有限。「雙簧信」事件則通過製造話題，擴展了《新青年》的影響力。

究其過程，先是錢玄同偽託「王敬軒」之名寫了一封文言書信，以保守主義者的立場和精英主義的角度，對於《新青年》的新思想、新文學主張逐條進行批駁，客觀上把《新青年》的觀點重新陳述出來。而《新青年》編輯部則在1918年3月15日出版的第四卷第三號上全文登載了這封信，並附上劉半農的覆信（下稱〈覆王敬軒書〉），對其觀點進行反駁，言辭激烈潑辣。全文用白話寫作，引用了大量民間俗語、俏皮話、戲曲曲文，以諷刺挖苦、起外號、戴帽子等手段進行反擊，認為王敬軒「不學無術，頑固胡鬧」，此八字可以「生為考語，死作墓銘」³⁴。這樣的反擊手段較為激烈，而「設局」的方式也並不體面，自然引起了爭議（後文將詳述）。但另一方面，事實證明這種鬥爭方式確實有其效果。當時還在清華大學唸書的小說家朱湘就回憶道³⁵：

……那時候，正是文學革命初起的時代；在各學校內，很劇烈的分成了兩派，贊成的以及反對的……是劉半農的那封《答王敬軒書》，把我完全贏到新文學這方面來了。現在回想起來，劉氏與王氏還不也是有些意氣用事，不過劉氏說來，道理更為多些，筆端更為帶有情感，所以，有許多人，連我也在內，便被他說服了。將來有人要編新文學史，這封劉答王信的價值，我想，一定是很大。

之後隨着新文化運動的擴大，以及《新青年》同仁不斷向反對以白話作為唯一正統語言的林紓發起的攻擊，於是林紓寫了諷刺小說《荊生》、《妖夢》還擊新文學，卻正中這幫年輕人的下懷，如是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就在劇烈的爭論中得以擴大，而劉半農的一番作為也終於得到了大部分《新青年》同仁的認可。魯迅表揚他「跳出鴛鴦派，罵倒王敬軒，為一個『文學革命』陣中的戰鬥者」^{⑤⑥}，錢玄同也說：「半農寫小說，絕不與那禮拜六派相同，他有他的主張，絕不與那一般紅男綠女派同流合污。」^{⑤⑦}

劉半農的戰鬥策略，固然有着融入知識場域的考量，但他確實也有着對國家現實的不滿，希求變革，只是過去一直相信折衷的改良，而沒有革命的啟蒙意識。周作人說他「看到不滿意的事，就要說。看到不合理的事情，他就要批評。而他也有他自己的主張。他寫文章，雖則是好罵人，但不是惡意的」^{⑤⑧}。而劉半農對於反對者不依不饒的進擊態勢，也與魯迅反對「費厄潑賴」(fairplay)的鬥爭策略異曲同工。然而，這批戰鬥性的文章，已經逸出了劉半農所擅長的「文學的啟蒙」，而在他並不擅長的「啟蒙的文學」領域發出了一些可能並未思考成熟的攻擊。劉半農並不像胡適、魯迅那樣對於思想革命有着非常自覺的意識與理論框架，他運用鬥爭色彩強烈的語言搖旗吶喊的多是他人的思想觀點，如1918年在〈隨感錄·七〉中批評保守主義者「保存國粹」、「融會中西，斟酌新舊」等觀點，基本上是在重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⑤⑨}，使其在上海時期已經產生的偏於譏諷與挖苦的口語化語言掩蓋了其思想內容，甚至幾近罵街，這對於思想啟蒙很可能會產生反效果。此外，他在〈覆王敬軒書〉、〈「作揖主義」〉與〈言文對照的尺牘〉中潑辣的文風，甚至有些譁眾取寵的通俗幽默，引起了當時部分學者的反感^{⑤⑩}。劉半農過去在上海殘留的慣習，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他後來離開《新青年》編輯部。錢玄同於1919年1月24日在日記中寫道：「午後三時半農來說，已與新青年脫離關係，其故因適之與他有意見，他又不久將往歐洲去，因此不復在《新青年》上撰稿。」^{⑤⑪}

對於劉半農退出《新青年》編輯部，學界大都認為是因為胡適對於〈覆王敬軒書〉不滿^{⑤⑫}。胡適事後也對「雙簧信」事件頗有微詞，他在給錢玄同的書信中曾談到：「適意吾輩不當亂罵人，亂罵人實在無益於事」，「無論如何，總比憑空閉戶造出一個王敬軒的材料要值得辯論些」^{⑤⑬}。但劉半農退出一事距〈覆王敬軒書〉發表已九個月，似乎不合常理。據目前已知的材料，他的退出可能與其在《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出版的第五卷第六號上發表〈言文對照的尺牘〉有關^{⑤⑭}，或因胡適對此文不滿，二人矛盾激化，於是劉半農在1919年1月主動離開了《新青年》編輯部。

劉半農在《新青年》文人圈已經做出了巨大的自我改造，努力配合該刊的工作與思想主張，卻依然引起場域內的紛爭。他對於自己在場域內相對尷尬的處境也有所感知，況且他非常在意臉面，很難在《新青年》編輯部繼續工作。而對於新文學，他在戰鬥過後對這類文章的寫作產生了倦怠情緒，錢玄同在1919年1月24日的日記曾記載：「半農初來時專從事於新學。自從去年八月以來頗變往昔態度，專為在故紙堆裏討生活，今秋赴法擬學言語學。照半農的性質實不宜於研究言語學等等沉悶之學。獨秀勸他去研究小說、戲劇，我與〔沈〕尹默也很以為然。日前曾微勸之，豫才〔魯迅〕也是這樣地說。」^④

劉半農作為北大預科教員，在學歷與學力上曾遭受質疑，如周作人提到：「可是英美派的紳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諷，使他不安於位，遂想往外國留學……」^⑤「劉半農因為沒有正式的學歷，為胡適等人所看不起，雖然同是『文學革命』隊伍裏面的人，劉半農受了這個激刺，所以發憤去掙他一個博士頭銜來，以出心頭的一口惡氣」^⑥。然而，劉半農並沒有在這樣的質疑下意志消沉，而是決心在語言學上做出成績，回擊質疑。此後他也沒有完全脫離《新青年》，依然在此刊物上發表文章，不過再也沒有思想性的戰鬥性文章，都是一些實驗性的白話詩寫作。

雖然「專為在故紙堆裏討生活」的轉變，在錢玄同眼中是一改往日態度，但就劉半農整個思想進程而言，卻有點恢復到五四之前「崇敬往聖」、「一心想做古文家」的傾向^⑦。這種轉變，過去學者常認為是「戰士」劉半農的墮落，放棄了戰鬥，而轉向了古文獻與語言學。這種看法假定了「革命」高於「傳統」，「鬥爭」高於「學術」的前提，而這本身就值得懷疑。聯繫劉半農過往對於傳統的溫和折衷態度（提倡舊劇，不明確反對孔教），他在1918年短短一年間的兩次轉向（開始「文學革命」筆戰；轉向古文與語言學工作）或可解讀為：相對傳統和保守的劉半農嘗試了《新青年》的激進傾向，但並不十分適應與愉快，甚至有少許違心，於是決定回歸到他既有的對傳統的溫和態度中，開始對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這也是基於自己學術根基薄弱的上進之舉。

賀麥曉曾在研究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誌的專著中，以專章講述劉半農在《新青年》的詩歌翻譯風格轉型中的彥扭與限制，認為新文學具有專斷宰治的特性：「新文學運動所做的，遠不止是將中國詩歌從傳統規範中『解放』出來；它也以新的，有時同樣是嚴格或武斷的界限代替這些規範，而且這些界限仍繼續主導着中國現代詩歌寫作與欣賞的方式。」^⑧賀麥曉認為劉半農被這些界限專斷地改變了自己熟悉而感興趣的文學形式，遷就「文學革命」的理論，這也影響到其自身的創作風格，形成了一種個人文學形態的斷裂。

三 劉半農的邊緣知識份子身份與權勢轉移

劉半農在《新青年》時期有一條線索始終沒變，即他從未正面批評孔教及其價值體系。除了上文引述過的「改良文學，是永久的學問；破壞孔教，是一時的事業」這種策略性的批評外，即使在最激進的〈覆王敬軒書〉中也沒有直接

批評孔教。批評孔教的內容都是陳獨秀、錢玄同、魯迅等人在做的事業，劉半農最多是在旁邊吆喝了幾聲罷了。他在〈覆王敬軒書〉中說：「本誌排斥孔丘，自有排斥孔丘的理由。先生如有正當的理由，儘可切切實實寫封信來」^⑤，「自有……的理由」無非就是「一時之策略」吧。他又說「記者則以為處於現在的時代，非富於新知，具有遠大眼光者，斷斷沒有研究舊學的資格」^⑥，認為新學有利於舊學的研究，可見他並沒有要對傳統思想加以全盤否定。實際上他一貫支持二者共存，而非常規意義上我們理解的五四式的「與傳統斷裂」。回溯劉半農的一生，他也沒有為了「趨時」的鬥爭策略，而違心地否定傳統。

胡風在1930年代就指出了劉半農這一種模稜兩可、不夠戰鬥的傾向，並批評道^⑦：

五四時代的風起雲湧的關於「人生價值」和「人生態度」的討論，在這裏並沒有甚麼痕迹，只在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所作的擬「擬曲」，〈兩盜〉和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所譯的《天明》裏面可以看出反抗強暴同情弱者的態度，而且他〔劉半農〕底同情並不是源於甚麼明瞭的社會見地……在他裏面並不能看到華麗的人生哲學底高揚。

所以，他底功績只是在反對文言，反對尊孔，反對迷信，反對林琴南〔林紓〕式的翻譯，反對舊戲，反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式國粹派……等具體的鬥爭上面。

胡風將劉半農的功績主要歸結為實踐層面的鬥爭，而非思想領域的建設，稱之為「平凡的戰鬥主義」，而劉半農「實事求是」的五四精神也的確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只抓着現象的問題而不能了解它在全體上的意義」，甚至進一步認為他「漸漸地離開了『戰鬥』而只剩有了『平凡』」^⑧。胡風認為劉半農在五四運動後出國，「對於專門學問的興趣固然也是一個原因，但同時不也就說明了他對於當時的戰鬥原來就沒有很深的執著的麼？」^⑨胡風以左翼文藝理論、「革命為綱」的視角解讀劉半農，不免有些偏差，但卻在一定程度上道破了劉半農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副線角色，以及他在思想領域的失語狀態。

劉半農離開《新青年》，表面上是知識場域內的「排異效應」和個人性格原因，導致他停止了所謂的「戰鬥」，然而考慮到其自身對於傳統文化的好感（依然有著傳統知識份子的士大夫情結），劉半農加入到這場思想運動中本就是場意外，其退出的實質還是在於他與《新青年》同仁在思想上的分歧。

汪暉認為五四運動中參與者的觀念並不一致，是一個「龐雜而缺乏內在邏輯的意識洪流」^⑩，而他們的聚合是「在『態度的同一性』基礎上形成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它的對象性：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和社會的批判和懷疑。『態度』的對象性特徵決定了這個思想運動的各個組成部分必然在與對象的否定性關係中一致起來……否則對立和分離就不可避免」^⑪。從這個角度看，《新青年》文人圈也體現了「因時而聚」、最後分離的必然性，而實質上連「態度的同一性」上都不能完全做到的劉半農，在短短一年之後就離開《新青年》編輯部也就可以理解了。

劉半農在《新青年》時期最主要的貢獻，除了以上所引述的戰鬥策略之外，主要在於對白話文的推廣和民間文學的提倡，還有他本人的白話詩創作。劉半農之所以對白話與民間文學如此感興趣，與他的邊緣知識份子身份有很大關係。

「邊緣知識份子」這一概念，在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一書中有着準確而精彩的論述。邊緣知識份子處於普通民眾與傳統知識份子之間，既沒法在傳統的學術上取代後者，同時又不甘成為前者；因為處在傳統階層之外，所以常常有種「不在其位」的怨懟心態；又因新的行業還未真正興起，許多時候只能棲身於報刊，晚清民初有很多新學教育背景的知識份子皆如此^⑦。1918年1月，胡適歸國後第一時間就發現了這種情況：「如今中學堂畢業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無能的遊民。這都由於學校所教的功課與社會上的需要毫無關涉。」^⑧劉半農幼年時入讀新式小學堂（江陰翰墨林小學），後又入讀新式中學堂（江蘇省常州中學），接受新式教育，學習珠算西文，古典詩文方面基礎薄弱。雖有一定的外文基礎讓他有機會進入中華書局，成了一名英文編譯，但與過去儒生的功名理想相比，則相去遠矣。

像劉半農這樣古文功底並不突出的邊緣知識份子，在古典文學的場域中是沒有話語權的，所以再造場域及自我塑造話語權便成為一種可能的出路。在文學上，要與傳統文學對立，最徹底的方法就是提倡變革文言文。這場文學革命其實有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史背景，但是對於許多邊緣知識份子來說，它卻是一次向上流動的難得機會。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人，即使在舊文學場域中多少也有一定的位置，但是像劉半農這樣的邊緣知識份子，如果文學事業的重心不轉移到白話文、白話詩（「增多詩體」，「破壞舊韻，重造新韻」），民間文學不能提升地位（提倡戲曲等通俗文學），那麼他在傳統的文學場域中便很難獲得新生的機會。對很多邊緣知識份子來說，白話文運動滿足了他們成為精英階層的盼望。胡適說過：「小孩子學一種文字，是為他們長大時用的；他們若知道社會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種文字，全不用那種文字來著書立說，也不用那種文字來求功名富貴，他們決不肯去學。」^⑨

胡適對於白話文運動的理論自覺，陳獨秀非常讚賞，也非常認同：「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章行嚴〔章士釗〕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⑩這樣一種高度自覺的白話文運動，針對的對象就是對白話文較熟悉，以閱讀白話小說為習慣的邊緣知識份子或普通識字者。當這些昔日還只能從事普通事業的人，被新文化運動許諾了進入文學中心的機會，他們的積極態度是可想而知的。羅志田一針見血地指出：邊緣知識份子自己創造了社會對自己的需要^⑪。

劉半農在加入《新青年》之後就明顯看到了這種上升到文學精英階層的機會，正是通過鼓吹白話文與民間文學，他可以在文學場域中發展自己的興趣與所長。《新青年》的理論號召與劉半農自身的興趣與特長吻合，無怪乎他始終致力於通俗化的問題、民間文學，也大量創作白話詩。他的熱情與戰鬥精

神部分源於此，這也是他一直堅持「文學的啟蒙」的原因。可以說，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作為邊緣知識份子的劉半農既是被啟蒙者，同時也是受益者。

邊緣知識份子的崛起有着很深遠的社會影響，他們因新文化運動的號召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話語權，顛覆了文學格局，而其中的一些年輕人凝聚出更加激進的傾向；視《新青年》同仁為「落伍」的創造社、太陽社對於魯迅乃至劉半農的攻擊，以及左翼文學在1930年代的立場都是鮮明的例子。羅志田對這種趨勢有着精確的把握^②：

本來邊緣知識份子因在社會變動中上升的困難，就更迫切需要寄託於一種高遠的理想，以成為社會上某種更大的事業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對社會政治等的參與感要比其他許多社會群體更強。白話文的推廣既擴大了邊緣知識份子的隊伍也強調了他們的影響，白話文本身同時又為日後的標語口號演說等政治行為的興起埋下了伏筆。故蘇俄式的群眾政治運動方式尚未引進，其在中國得以風行的土壤已經準備好了。胡適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邊緣知識份子自覺在後；他們一旦自我覺醒，參與意識更強，就要在社會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劉半農卻與大多激進的年輕人取徑不同，五四運動後他開始遠離文學中心。而他堅守學術崗位、自我邊緣化的舉措，則鮮明地表露了他對激進主義的否定態度。與此同時，正是因為他擺脫了邊緣知識份子的身份，來到了新文學場域的權力中心，他的激進傾向就逐漸消逝了，轉而成為守成者。魯迅批評的「當時的白話運動是勝利了，有些戰士，還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為白話戰鬥，並且將它踏在腳下」^③，確也有其道理所在。

四 作為守成者的劉半農：遠離文學革命

1920年，劉半農赴英留學，次年轉赴法國，錯過了中國邊緣知識份子極速崛起的五年，因此在1925年8月歸國後對於彼時年輕人的想像及社會形勢的判斷產生了偏差。回國之前，在法國遙遙掛念國內情勢的劉半農，眼見政治局勢愈加紛亂，新文化運動具體成果寥寥，不免有些失落，心態也發生了變化，在一些文章中也流露出更多的疏離現實傾向，如他在1925年1月與周作人的通信中就表露了當時的心境^④：

你所說的「我們已經打破了大同的迷信，應該覺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耳。」我在國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這一句話。

……X主義下的火腿就不好，Y主義下的就是蜜甜的，但就我原始基本的感覺說，只須問是不是火腿，更不必問甚麼。……我並沒有功夫，精神，興趣來宣傳我這種主義。

劉半農在此已經流露出對宏大敘事與主義林立的懷疑，此時，他對於「舊」的不排斥以及對於中國現實的絕望態度，可謂十分明顯⁶⁵：

法國的社會是很守舊的，不錯，凡是到過法國的人，都可以知道法國的一般社會，真是舊得可以，但是舊儘可以舊，卻是有活氣的，不是麻木不仁的。所以要是一旦有了個甚麼新說，與原來的舊說不能相容的，社會上就可以立時起一個大波動。

中國的社會卻並不如此。說是舊罷，六十歲的老翁也會打撲克。說是新罷。二十歲的青年也會彎腰曲背，也會搖頭，也會抖腿，也會說「然而」。實際卻處處是漠不關心，「無可無不可」。

他在巴黎大學取得文學博士後，1925年底回到北大任教，除了從事《何典》的編校以及《揚鞭集》、《瓦釜集》的出版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應成仿吾的邀請，主編《世界日報·副刊》。過去劉半農都是依託他人的雜誌平台發聲，有時發表的文章並不能完全表達他自己的心意，必須依從報刊整體的傾向；如今他終於有了自己的副刊，可以按照個人意願來確定刊物的風格。如果說劉半農在《新青年》時期是因為胡適、陳獨秀開闢了戰場，使得他可以走上前去呼喊，那麼現在劉半農就在《世界日報·副刊》中開闢了自己的戰場。1926年，他在〈也算發刊詞〉中說道⁶⁶：

生平之所絕對不能者，卻有三事：即是擔糞着棋之外，再加上一個談政。……副刊既由我辦，事實上就只能依着我的脾胃辦去……專門的講學文章，應當有專門的書報去發表，決然不是甚麼普通的日報可以代為經辦的。普通的日報，只是給我們隨便瀏覽瀏覽，將一天中的用不着的光陰，消磨去一部分，而同時也說不定可以得到一些小益處。……因其如此，我們在這副刊裏，也不妨意到筆隨的亂談天……現在有了這副刊，亦許這「群言」的風氣，不免要流播一些過來。若說這種的亂談是不值一笑的，那也就用不着你說，我們自己，早就知道是不值一笑的；而況我們這些人，「文不能測字，武不能打米」，也完完全全是不值一笑的。話說完了。最後一句是：我辦這副刊，辦得下就辦，辦不下就滾蛋！

劉半農這一席話，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如前所述，曾經被周作人形容為「看到不滿意的事，就要說。看到不合理的事情，他就要批評」的劉半農，如今竟提出避談政治，有志於「閒適任誕」，張起無關現實的小品文的旗幟，這種傾向也成為了1930年代《論語》、《人間世》與《宇宙風》雜誌的先聲。周作人也發表〈條陳四項〉附和：一、不可「宣傳赤化」或曰「莫談國是」；二、不可吹捧章士釗、段祺瑞；三、不可太有紳士氣，也不可太有流氓氣；四、不可輕蔑戀愛⁶⁷。然而，支持新文學的讀者就未必能夠接受這種轉變——在他們心目中，他依然是寫「雙簧信」時的劉半農。

因着以上所述的較為主觀的編輯方針，劉半農在選擇稿件上相對主觀，曾一度鬧出「只登名家」的事件。年輕人因投稿未被刊用，就在其他報刊上詆譏他不尊重「無名作者」；他也承認自己選稿很主觀：「〔年輕人〕稿子的內容，以關於性的苦悶與經濟的壓迫者為最多，但我並沒有盡量選登，因為只是那幾句話，翻來覆去的說，還是那幾句話。」^⑥

這樣的態勢，自然是不討年輕人喜歡。且劉半農剛剛回國時，既出於興趣，也由於北大長期欠薪，因此編撰校點了很多古書，如《何典》、《香奩集》等等。左翼年輕文人此時正在崛起中，新創刊的《幻洲》編輯葉靈鳳及潘漢年便對新文學權威學者文人發起了全面的攻擊，劉半農也是對象之一。1926年底《幻洲》刊載多篇文章斥責劉半農的「復古傾向」，認為他的《揚鞭集》書籍裝幀太老式^⑦。這本來是很無聊的攻擊，但劉半農對於這種文字挑釁卻沒有沉住氣，1927年初就寫了一篇〈老實說了罷〉回擊批評，認為部分年輕人不學無術、戾氣重，品格也有問題^⑧。於是一場大規模的筆戰開始，許多年輕人對其圍剿，前後文章有幾十篇。

署名潑皮男士的〈博士的勝利〉戲仿劉半農的語氣：「『老實說了吧，』你們不要罵我，趕快去讀幾年書，學幾外國文，再來和我碰，現在我無論如何比你們高明！」^⑨潘漢年又有一篇〈從語絲講到江紹原與劉博士〉，批評更是激烈^⑩：

講到劉半儂，又使我生氣，他本來是新流氓氣十足的青年，不曉得他怎樣，從法國回來以後，漸漸的變為沒有思想，慢慢的成了Gentleman！你看他近來有甚麼乾脆的文字寫來沒有？……

以前「新青年時代」他是被老年人壓迫，舊勢力包圍，而他自己極力想掙扎起來做一個真正的人，所以「狂喊亂叫」的都是「人的話」；「胡作妄為」的都是「人的事」；現在他已經得了花樣很多的博士，（他的卡片上刻着許多的頭銜）只想顧全面子身份，自然漸漸的沒有以前那種新流氓精神，慢慢的成為Gentleman，走到老年人的死路上去了！

潘漢年的論述在年輕人中甚受歡迎，《新青年》時期那個「罵人」的、「新流氓氣十足」的劉半農是大眾最熟悉的形象，年輕人自然將他如今的保守傾向視為落伍與反動，這套左翼話語也影響了1930年代左轉後的魯迅所寫的〈憶劉半農君〉：「曾經戰鬥，如今落伍」的一席話^⑪，基本上將劉半農的文學生涯蓋棺定論。1949年之後的文學史論述長時間帶有左翼色彩，這樣偏頗的看法也產生了很長久的影響力，實在有必要重新審視。

面對年輕人的圍剿，劉半農接連寫了〈「老實說了」以後〉、〈為免除誤會起見〉反擊，鬧出《世界日報·副刊》的位置登了許多論戰文字，而由於筆戰太過激烈，年輕人不依不饒，場面比較失控。最後，劉半農在1927年1月28日寫了〈「老實說了」的結束〉，單方面宣布筆戰結束^⑫。兩天後，他託病辭去了《世界日報·副刊》主編的職務。

在這次論戰中，劉半農就像新文化運動中的林紓那樣，被年輕人激將而起，展開論戰，反倒成為了年輕人成名的工具；而諸如潑皮男士這種文章作

法，活脫脫是1918年劉半農寫作的翻版，是為「新流氓主義」。曾經激進的劉半農，被如今更激進的後輩擊敗了。在這場鬥爭中，那個「鴛鴦派」的陰影又不斷找上他，迂迫就在《人間世》的「今人志」欄目中談及^⑥：

青年人反攻了：「你以前呢？半儂不是你麼？阿要面皮？」這樣消極的駁雜，在半農很可以承認這篇文章是罵過去的自己的，但是以克服自己的經驗來勸勸青年，不也是很對的事情嗎？可是半農始終否認……他厭憎自己的過去到了「非自己」的程度了。

迂迫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自劉半農留學歸來，他對自己的定位已經是大學教授、語言學專家了。大概是因為自卑同時也是得償所願的心理，劉半農不願再重拾過去作為邊緣知識份子而必須戰鬥的潑辣風格（或曰慣習），甚至不再戰鬥了。因為這種不能接受自己的過去的「心虛」，當劉半農再次見到中學同學錢穆時，完全不談中學肄業的事，也不願多談《新青年》，只是以教授自居^⑦。1928年初因與魯迅交惡，他退出《語絲》撰稿人群體^⑧。至此，劉半農徹底放棄了「文學的啟蒙」立場，成為了一個專研學術，遠離「現實」的大學教授。

我們在此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場以新文化運動為背景的權勢轉移中，劉半農在數年間微妙的位置變化：從一個失業編輯到一個大學教授，從一個不滿現狀的邊緣知識份子轉變為一個守成者；也從一個叫陣者，變成了一個被挑戰者。

五 小結

劉半農在加入《新青年》、參與五四新文學的歷程之中，完成了從通俗文學場域向新文學場域的跳躍，也完成了邊緣知識份子身份的剝離，以及成為第一高等學府教授的權勢轉移。然而誠如上文所論及的，劉半農與新文學發生聯結，一方面帶有偶然性與被動性，他加入《新青年》並沒有明確的啟蒙初衷；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思想也帶有個人的局限性，礙於自身閱歷與知識結構，劉半農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除了在「文學的啟蒙」上有着通俗化的改良傾向之外，並沒有產生個人的思想革命以及「啟蒙的文學」上的建樹，所以說，劉半農的局限性使得他不能在更大的範圍踐行新文化運動的主張。

劉半農在被新文學啟蒙後，固然逐漸生發出對於「統一思想」的有價值的反思，但不能否認，他在五四運動之後所表現出的保守思想傾向，在時人看來是一種倒退，同時也是邊緣知識份子隨着權勢轉移、來到權力中心後，因為地位的穩固與既得利益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而這種權位意識，依然與傳統士大夫同出一轍，從中亦可見邊緣知識份子在思想認知上更生成為現代知識份子歷程之艱難。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不可磨滅的重要思想與文學革命，其所追求的價值與社會理想，為一代又一代的知識份子所踐行，其歷程亦充滿着

艱難與曲折，即便在新文學內部，亦存在不同調的情況。通過對劉半農個人的思想史研究，即可窺見整個新文化運動在個體身上巨大的力量與豐富的意涵。劉半農、周作人、錢玄同等一批五四同仁，在1930年代逐漸遠離文學革命，甚至大作文言文章，鼓吹小品文，成為左翼文人攻擊的對象，這些衝突的蹤迹，或許可以從劉半農在1920年代的遭際與思想變化中，窺看到一些線索。

註釋

- ① 參見劉禾著，宋偉傑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49-52。另可參見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 ②⑦⑧⑩ 魯迅：〈憶劉半農君〉，載《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72；72；73；73。
- ③⑬ 周作人：〈三沉二馬下〉，載《知堂回想錄》，下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420。
- ④⑫ 劉半農：〈雙鳳凰磚齋小品文（五十四）·記硯弟之稱〉，《人間世》，第16期（1934年11月20日），頁15。
- ⑤ 徐瑞岳編著：《劉半農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劉半農年譜》（徐州：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1989）；《劉半農評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 ⑥ 賀麥曉（Michel Hockx）著，陳太勝譯：《文體問題——現代中國的文學社團和文學雜誌（1911-193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第五章；洪長泰著，董曉萍譯：《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份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頁53-65。
- ⑦ 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新青年》，第3卷第3號（1917年5月1日），頁1-13；〈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1日），頁1-10。此時他已經向包天笑預支了上半年的稿酬，預備赴京，參見下文包天笑之引文。本文所引《新青年》為1954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影印本，下引不再另註。
- ⑧ 陳思和：〈中國新文學發展中的兩種啟蒙傳統〉，載《陳思和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31-32。
- ⑨ 劉半農、陳獨秀：〈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號，頁22。
- ⑩ 劉半農：〈梅蘭芳歌曲譜·序〉，載劉天華編：《梅蘭芳歌曲譜》（梅蘭芳自印本，1930），頁1。
- ⑪ 歐勒魯（Max O'Rell）著，半農譯：〈看護婦〉，《小說大觀》，第7集（1916年10月），頁1。
- ⑫ 半農起稿，天笑修辭：〈可憐之少年〉，《小說畫報》，第3期（1917年3月），頁8。
- ⑬ 包天笑：〈編輯小說雜誌〉，載《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頁381。
- ⑭ 孫超：《民初「興味派」五大名家論（1912-1923）》（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頁75。
- ⑮ 平襟亞：〈「鴛鴦蝴蝶派」命名的故事〉，載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上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頁184。
- ⑯ 羅家倫口述，馬星野（偉）筆記：〈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1931年8月26日），《傳記文學》，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頁17。
- ⑰ 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頁424。

- ⑲⑳ 〈劉半農致錢玄同〉(1917年10月16日)，載鮑晶編：《劉半農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頁109。
- ㉑ 參見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 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 *Poetics* 12, issue 4-5 (1983): 312。
- ㉒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14.
- ㉓ 參見《新青年》，第4卷第1號(1918年1月15日)，封面。周作人說：「劉君初到北大還是號半農，友人們對他開玩笑，說農字很有禮拜六氣，他就將人旁去了……」參見周作人：〈劉半農與禮拜六派〉，載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十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頁426。禮拜六派是以《禮拜六》等都市通俗文學雜誌為園地的作家群，提倡消費主義，以戀愛為最主要寫作主題。在五四語境下，常被視為腐化墮落。
- ㉔⑳ 賀麥曉：《文體問題》，頁197。
- ㉕ 劉半農：〈答Y. Z. 君〉，《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15日)，頁635。
- ㉖㉗ 劉半農：〈隨感錄·七〉，《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頁347。
- ㉘ 劉半農：〈隨感錄·十五〉，《新青年》，第5卷第1號(1918年7月15日)，頁77。
- ㉙ Pierre Bourdieu, "Le marché des biens symboliques", *L'Année sociologique*, vol. 22 (1971): 62.
- ㉚ 劉半農：〈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頁7-8。
- ㉛ 劉半農：〈我之文學改良觀〉，頁7-9。
- ㉜㉝ 周作人發言，參見〈劉半農追悼會概述〉，《磐石雜誌》，第2卷第12期(1934年12月1日)，頁22。
- ㉞㉟① 記者(半農)：〈覆王敬軒書〉，《新青年》，第4卷第3號(1918年3月15日)，頁284；269；283。
- ① 朱湘：〈「雙簧信」的影響〉，載《劉半農研究資料》，頁307。
- ② 魯迅：〈趨時與復古〉，《申報·自由談》，1934年8月15日，頁3。
- ③ 錢玄同發言，參見〈劉半農追悼會概述〉，頁22。
- ④ 劉半農：〈覆王敬軒書〉，頁268-84；〈「作揖主義」〉，《新青年》，第5卷第5號(1918年11月15日)，頁519-22；〈言文對照的尺牘〉，《新青年》，第5卷第6號，補白，頁587。
- ⑤⑥ 錢玄同著，楊天石編：《錢玄同日記(影印本)》，第四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頁1751。
- ⑦ 沈尹默在1950年代的一篇文章是這種觀點的源頭：「陳獨秀到北大後，把《新青年》雜誌移到北京來辦，由北大幾個同人分別任編輯。有一期是歸錢玄同輪值編輯的，登了一篇王敬軒和林琴南〔林紓〕新舊鬥爭的文章，大部分是劉半農的手筆，而博士〔胡適〕大為不滿，認為這樣不莊重的文字有失大學教授的尊嚴體統，硬要把這個雜誌編輯要歸他，這一來，惹起了魯迅弟兄的憤慨，他們這樣說：《新青年》如果歸胡適一人包辦，我們就不投稿。又是我多事，出頭向胡適說，你不能包辦，萬不得已時，仍舊由獨秀收回去辦倒可以。」(沈尹默：〈胡適這個人〉，《大公報》〔香港〕，1951年12月21日，第1張，第2版。)這段文字後來被胡適看到了，於是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胡家健從香港寄來剪報《大公報》，有十二月二日《大公報》在上海開的『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的記載與資料。……沈尹默的一篇則是全篇扯謊！這人是一個小人，但這樣下流的扯謊倒是罕見的。」(《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卷，頁173-74。)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形勢與胡適在1950年代中國大陸的形象，沈尹默在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上對於「胡適這個人」的「交代」，其真實性確實值得懷疑，另外，「又是我多事，出頭向胡適說」這樣的說法似乎政治撇清的色彩更為濃厚。
- ⑧ 〈胡適致錢玄同〉(1919年2月20日)，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4-25。

- ④④ 沈尹默在私下場合回憶《新青年》內部的分裂時，說法與他在胡適思想批判座談會上的報告有些不同。他回憶道：胡適對劉半農在《新青年》上發表的〈言文對照的尺牘〉（《新青年》第5卷第6號）一文很看不上，兼之劉半農沒有學歷，欲把他趕出《新青年》編輯組，但遭錢玄同反對。參見沈鵬年：〈魯迅和《新青年》的若干花絮——在電影《魯迅傳》創作組的採訪札記〉（原標題為〈魯迅與《新青年》同人關係探索〉），載《行雲流水記往》，上卷（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頁201-203。另可見錢玄同：「適之此次來京，路過南京、上海，不知怎樣，挨了人家的罵，一到就和獨秀說，有人勸我，為甚麼要同這幫人合在一起……」參見《錢玄同日記（影印本）》，第四卷，頁1751。
- ④⑤ 周作人：〈卯字號的名人三〉，載《知堂回想錄》，下冊，頁410。
- ④⑦ 周作人：〈北大感舊錄八〉，載《知堂回想錄》，下冊，頁570。
- ④⑧④⑨④⑩ 胡風：〈五四時代底一面影〉，《文學月刊》，第4卷第4號（1935年4月），頁633；636-37；637。
- ④⑪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1206。
- ④⑫ 汪暉：〈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載《汪暉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313、313-14。
- ④⑬④⑭④⑮ 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127；141；148-49。
- ④⑯ 胡適：〈歸國雜感〉，載《胡適文存·卷四》（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頁10。
- ④⑰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集導言〉，載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39。
- ④⑱ 陳獨秀：〈答適之〉，載陳獨秀主編，吳曉明編選：《德賽二先生與社會主義——陳獨秀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頁244。
- ④⑲ 魯迅：〈感舊以後（下）〉，《申報·自由談》，1933年10月16日，頁4。
- ④⑳ 劉復：〈巴黎通信〉，《語絲》，第20期（1925年3月30日），頁1。
- ㉑ 劉復：〈譯「茶花女」劇本序〉，《語絲》，第88期（1926年7月19日），頁1。
- ㉒ 劉復：〈也算發刊詞〉，《世界日報·副刊》，1926年7月1日，頁1-2。
- ㉓ 周作人：〈條陳四例〉，《世界日報·副刊》，1926年7月10日，頁1。
- ㉔ 劉復：〈五年以來〉，《世界日報·副刊》，1931年8月31日，頁1。
- ㉕ 裴華女士：〈洋翰林劉復「復古」〉，《幻洲》，創刊號下部（1926年10月1日），頁11-13；潘漢年：〈釘梢「洋翰林劉復復古」〉，《幻洲》，第2號下部（1926年10月16日），頁53-58。
- ㉖ 劉復：〈老實說了罷〉，《世界日報·副刊》，1927年1月14日，頁1。
- ㉗ 潑皮男士：〈博士的勝利〉，《幻洲》，第1卷第9期下部（1927年2月16日），頁448。
- ㉘ 潘漢年：〈從語絲講到江紹原與劉博士〉（〈信手寫來〔三則〕〉之二），《幻洲》，第1卷第6期下部（1926年12月16日），頁286、287。
- ㉙ 劉復：〈「老實說了」的結束〉，《世界日報·副刊》，1927年1月31日，頁1。
- ㉚ 迂迫：〈劉復（半農）〉，《人間世》，第9期（1934年8月5日），頁43。
- ㉛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長沙：嶽麓書社，1986），頁73。
- ㉜ 1928年2月，劉半農在《語絲》發表〈林則徐照會英咭喇國王公文〉，文中談及林則徐「在印度昇屍……」（劉復：〈林則徐照會英咭喇國王公文——雜覽之十六〉，《語絲》，第4卷第9期〔1928年2月27日〕，頁35），有明顯的常識性錯誤。同年4月2日，《語絲》第4卷第14期上（當期魯迅編）發表了讀者洛卿的來信，指出了這一常識性錯誤（〈通信三 林葉更正〉，《語絲》，第4卷第14期〔1928年4月2日〕，頁45）。劉半農自尊受挫，之後絕少在《語絲》發表作品（只有1929年第5卷第29期發表過一首新詩），與魯迅的關係也產生了明顯的裂痕。